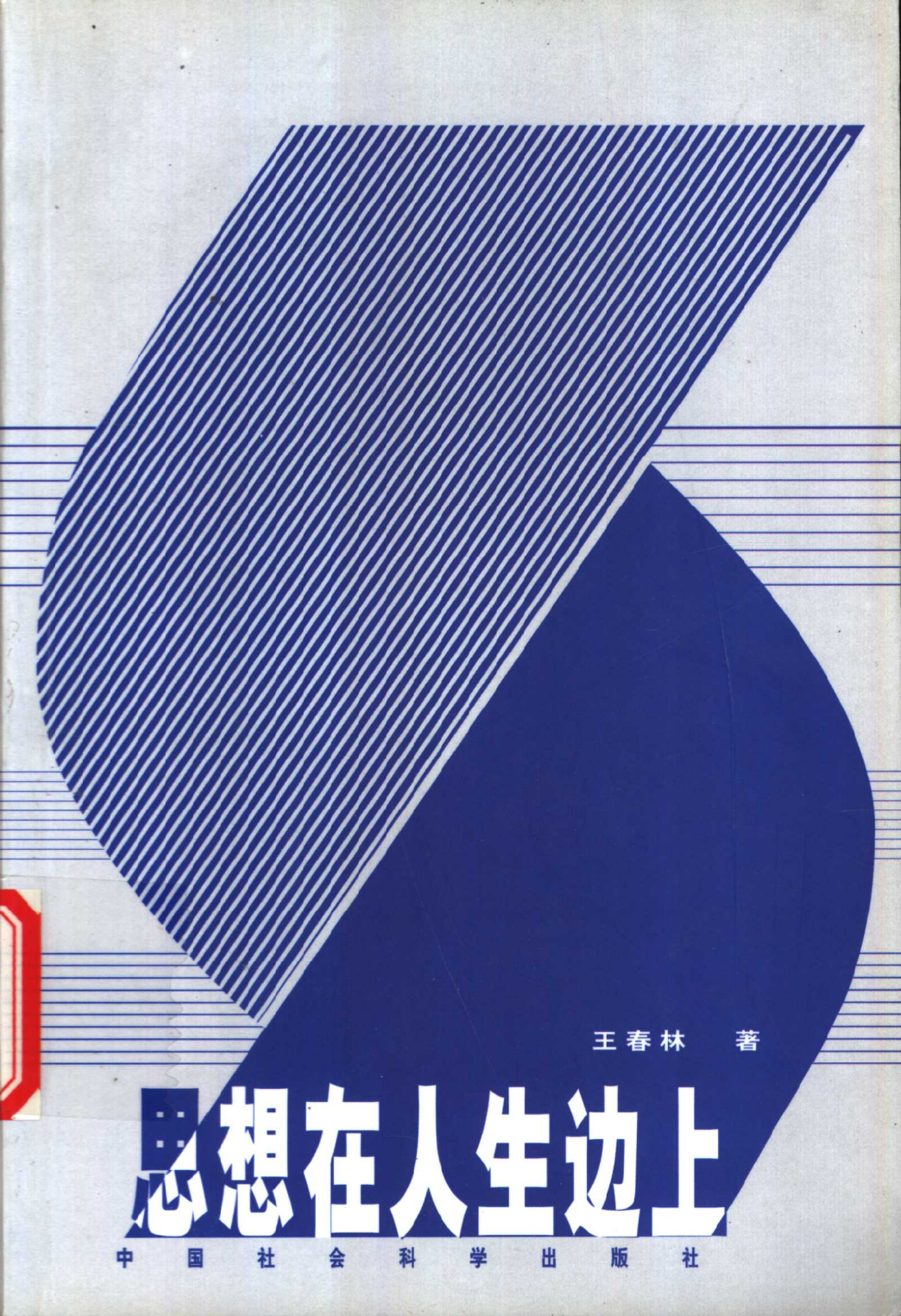




王春林 著

思想在人生边上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在人生边上/王春林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

ISBN 7-5004-3305-0

I. 思… II. 王…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5514 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奕 瀛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别北京

—— 代序

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的诗人龚自珍，既没有看到太平天国，也没有经历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攻略北京的耻辱。但是，龚自珍却在“盛世”中，深深地体会到“衰世”的危机和悲哀。他曾经把那个丧失了秩序、尊严、创造性和宽容精神的京城称为“鼠壤”。在“日之将西，悲风骤至”的情怀中，龚自珍写下过许多感天动地的警世篇章。这个生于所谓“康乾盛世”的悲情诗人，虽然孤独，虽然无人可懂，可终其一生，龚自珍也没有为了迎合“盛世”而放弃自己的道德和立场，没有为了随波逐流而放弃自己的情感和精神。这位道光九年的三甲第十九名进士，虽然说不上十二分的得意，但比起如今的“新人类”“新明星”们，真不知要风光多少倍！

自1990年以来，中国文学出现了重大

的变化。对这个变化已经有许多理论家做了许多的表述。但有一个变化没有被理论家们论述过，那就是新时期以来，一直处于“文学中心地位”的北京，无可奈何地滑落了。随着 80 年代末期全国文学评奖活动的停止，随着一场历史风波的起落，从原来的那个充满了权力色彩的“中心”里，一波又一波地发生出来的“文学运动”骤然失效。并且从此风光不再。就像倒了的违章建筑，大而无当的影子消失后，还会留下垃圾和废物。在那片废弃物上，尽管还有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官员和文学“明星”在替换，可已经没有谁拿他们当文学看待了。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包括一些身在北京的作家、评论家，都在以越来越独立的文学姿态参与和改写着方块字的文学史。其中变化之深广、复杂，意义之重大、深远，可谓空前，不是我这篇短文可以胜任的。这个变化之所以没有被理论所阐述，不是理论家无能，是因为历史从来都比理论大得多。在历史的浊流中沉浮的理论，从来都不可能把历史覆盖在自己理论的冰壳之下。

如今，滔滔天下的是“市场”，是“流行”，是“票房”，是“发行量”；是为了迎合市场、流行、发行量而制造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明星。三十多年前滔滔天下的是“革命”，是“伟大领袖”，是“红宝书”，是为了迎合革命、领袖、红宝书而制造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英雄”。忽而为革命而发疯，和忽而为市场而发疯的我，竟然是同样的中国人。当年横扫一切只要革命和专政的红卫兵，和如今也横扫一切只要肉欲和市场的痞子、宝贝儿，原来都是所谓不要道德的人。把形同天壤的明星和英雄拆开来看，骨子里竟是如此的一模一样！把形同水火的“权力中心”和“市场中心”对比一下，竟然看到同样的“专政”。专权独断、贪污腐败的官员，盗窃国有资产到处行骗的官商奸商，和为流行而流行的新星们都反对任何道德约束，都不约而同地视道德如粪土，视他人如吞咽

之物。尽管这中心不是那中心，可从中心里产生出来的都是同样臭气熏天的排泄物。

所幸者，天下并非只有“中心”。所幸者，在一些人自认的“中心”之外还有广阔的原野和高山。

十七年前的春天，我第一次到吕梁师专的时候，王春林还是一年级的学生。如今他已经是山西大学的教师，是文思敏锐、执着的文学评论家，并且已经有专著出版了。这一次，春林要我来作序，我就借题发挥说了上面这些文不对题的话。以春林的见识和修养，以春林的评论业绩，用不着我来说这些不温不火的“夸奖话”。在我的眼里，春林的声音是属于原野和高山的。春林没有亦步亦趋地跟着那片坍塌之物的喧嚣去学舌。在这个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上，春林留下了自己冷静沉着的批判之声。在我看来，一个好文学家的成就，不在于他同别人合唱了多少相同的、流行的题目，而在于他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坚持和发言。与孤独者同行是需要勇气和眼光的。在春林对山西作家成一长期而热情的关注中，我清楚地看到了一种力排众议的执着和眼光。在时下热闹而流行的文坛上，成一几乎一直是一个无声的缺席者。可凡是认真看过成一作品的人，都能体会到成一对汉语写作深刻、敏锐的探索成就非凡的贡献。一个远行者的身影，自然要被当前的热闹所忽视。可这忽视是忽视者的悲哀。这本集子里《匿名的时代本质》、《〈月牙儿〉：女性叙事话语与中国文人心态的曲折表达》、《温柔的精神光芒》等，可以为我的评价作证。因为有春林这样的同行者，在告别北京的旅途上才走得精神振奋。让我们坦荡地告别北京，告别那些自以为是的“中心”们，让我们离开那片坍塌的废弃物吧！在“鼠壤”之地的外面，有广阔无边的原野和高山。尽管原野和高山之上荆棘丛生、怪石嶙峋，根本就没有路，但“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是为序。

李 锐

庚辰年腊月二十六写，

辛巳年正月初三改定，

公元 2001 年 1 月，于太原

目 录

告别北京——代序 李 锐 (1)

上 编

对“文革”与知识分子的双重审视
——评王蒙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
..... (3)

神圣家族
——从《家族》看张炜的道德
乌托邦理想 (18)

思想在人生边上
——评张炜长篇小说《外省书》 ... (29)

《务虚笔记》：对“不确定性”的沉思
与表达 (44)

匿名的时代本质
——评成一长篇小说《西厢纪事》
..... (54)

女性生命的咏叹
——评蒋韵《栎树的囚徒》 (62)

温柔的精神光芒
——评蒋韵《闪烁在你的枝头》 ... (72)

荡涤那复杂而幽深的灵魂

- 评铁凝长篇小说《大浴女》 (79)

军人精神的艺术展示

- 评朱苏进长篇小说《炮群》 (90)

剖析现实与透视人生

- 评许建斌长篇小说《乡村豪门》 (101)

下 编

- 90年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117)

- 家族文化小说评述 (161)

《月牙儿》：女性叙事话语与中国文人心态的

- 曲折表达 (181)

- 政治与王蒙小说 (194)

政治·人性与“苦难记忆”

- 王蒙“季节”系列的写作意义 (205)

在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

- 对王蒙的一种理解 (214)

遗风之外的文化思考

- 评张石山系列小说《仇犹遗风录》 (223)

理性智慧的烛照

- 对钟道新中篇小说的一种理解 (231)

农民生存的冷静展示

- 评曹乃谦系列小说《温家窑风景》 (243)

马家军事件：真相与反思

- 评赵瑜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 (251)

- 石舟小说论略 (260)

- 莫言的奇思异想点滴 (270)

人和历史的悖反与错位

——读李锐中篇小说《传说之死》…………… (274)

且说《清白》…………… (278)

令人困惑的评奖…………… (283)

“晋军”怎么了

——亟待警醒的山西小说界…………… (287)

“是”与“不是”都说…………… (295)

后记…………… (299)

上 编

对「文革」与知识分子的双重审视

——评王蒙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

对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均产生了相当巨大影响的“文革”浩劫，在其结束之后的中国作家们业已有过太多建基于回顾、叙述与反思之上的艺术表现。尤其是在 80 年代前后的所谓“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中，不仅几乎所有的篇什都与“文革”有关，而且其中的很多篇什都以对“文革”历史经验的描述与反省为思考与表现的重心。在副标题为“解读 50 篇文革小说”的一部题名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①的颇有创新价值的学术著作中，批评家许子东写下过这样的话语：“在阅读了几百上千有关文革的小说后，笔者仍觉得自己的文革故事似乎仍然没有完全被叙述清楚。”^②由此即首先可以说明在“文革”后的中国文学界，的确出现了很多叙述“文革”故事的小说，其次则又说明在如此数量之巨的小说文本中，彼此之间的重复与相似应该说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以至于许子东只是从其中抽取了 50 篇小说作

细读式分析研究。而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虽然“文革”业已成为众多作家关注表现的焦点问题，虽然在这方面确已生产了如许子东所言“几百上千”有关文革的小说，可称为杰作者其实是寥寥无几的。但是也如许子东所言：“如何回忆和叙述文革的过程和细节，如何梳理和解释文革的来源和影响，这是一个很少中国（特指大陆）当代作家能够忽视和回避的题目。假如不先讲述文革的故事，倘若不先给文革一个‘说法’（借用张艺谋电影人物秋菊的说法），很多中国作家（及读者）似乎还不能从文化、道德及价值观的断裂心创中真正‘生还’，他们与传统文化及‘五四’的种种精神联系都很难延续。”^③的确如此，“文革”乃是横亘于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史上一个为中国作家所难以忽视和回避的题目，对于这样一个几可类比于欧洲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其中蕴涵着国人丰富而沉痛无比的人性经验教训的重要历史事件，每一位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性良知的中国作家都有着一再返顾，同时对此一事件作出更深入的思考以及更出色的艺术表现的必要。然而，从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的现实演进情形来看，关于“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与反思的小说创作却正处于日益淡出于作家们表现视域的境况之中。由于受到了逐渐膨胀的物欲潜在控制的缘故，时下走红的中国作家们所热衷于叙述的乃是都市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欲望故事，他们以这些欲望故事既刺激同时也满足着正置身于欲望之海中的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从一种总体文化感觉看，似乎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再去返顾如“文革”这般沉重异常的历史经验已经是明显地不合时宜了。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不合时宜”的王蒙却推出了他同样可以“不合时宜”称之的以全面展示描述“文革”历史经验为基本主旨的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但也正是这“不合时宜”才真正凸现出了王蒙作为一位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作家的社会、文化与人性良知之所在。《狂欢的季节》乃是隶属于王蒙“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第四部。在论述

王蒙“季节”系列写作意义的论文《政治、人性与“苦难记忆”》^④中，笔者曾这样写道：“虽然王蒙的下一个‘季节’尚在酝酿孕育之中，但毫无疑问的，‘文革’将成为其中最为核心的表现与思考对象。本世纪本民族最为惨痛的苦难记忆将化为小说文本中具体的人物与故事，以钱文、叶东菊他们个人生存的体验方式被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王蒙描述和记录下来。”从《狂欢的季节》这一小说文本的具体情形来看，可以说，笔者的预言基本上得到了相对圆满的印证，对“文革”历史经验的描述与反省确实构成了作家关注与表现的重心所在，构成了文本最为关键的中心情节。

提及王蒙的“文革”经验，从1963年举家西迁抵达新疆一直到1979年方才重返京城的特别人生经历是必须予以充分关注的，他自称那一段为“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我们注意到，迄今王蒙的小说中曾与“文革”发生过明显关联的计有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以及系列小说《在伊犁》等。上述作品中，《布礼》、《蝴蝶》中的钟亦成与张思远身上当然不可避免地有王蒙的影子存在，但从文本的情节构成看，却与新疆毫无干系。这就充分说明，如钟亦成、张思远此类人物的“文革”遭遇，基本是王蒙虚构出来的，它更多地体现了王蒙对“文革”的一种综合了很大理性观察成分的认识与思考。而《杂色》中的曹千里则明显开始与王蒙的新疆经历发生关联了，曹千里与那匹老马相伴前往夏季牧场的行程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王蒙的个人经历。但从文本的基本情节构成看，作品中除了对旅程的描写之外，其他则几乎都可看做是主人公在这旅程中的一些堪称复杂的思绪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更愿意把《杂色》理解为一部诗意浓郁的带有强烈抒情色彩的文学作品。由此看来，虽然曹千里已经与王蒙的新疆经历发生联系了，但从一种写实的角度来考察，则又完全可以断言其实《杂色》并未真正触及王蒙切身的“文革”经验。上述作品中，真正触及王蒙在新疆的“文革”经验的乃是他写作于80年

代初中期的《在伊犁》系列小说。此次为了本篇论文的写作，笔者再次重新阅读了这个系列小说。细读《在伊犁》，即可发现小说的故事背景当然是“文革”中的伊犁，而王蒙自己，在“文革”中自1965年起的确在伊犁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73年才从伊宁搬回乌鲁木齐。小说中的“王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直接理解为现实生活中的王蒙。但是在《在伊犁》中，“王民”所承担的更多是一位观察与叙述者的角色，小说只是借助于“王民”来向读者进一步描述展示“文革”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生活在伊犁的那些维族民众不乏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日常生活形（情）态而已。这就是说，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王蒙《在伊犁》所关注与表现的重心明显是倾向于“他者”的。而且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王蒙之《在伊犁》当时的表现重心并不是要表现“文革”背景下维族民众的生活情状与命运形态，而是把更多的关注点投向了对富有强烈地域特色的新疆维族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与基本精神状况的表现。换言之，叙述并反省“文革”并非《在伊犁》之写作主旨，该小说的写作主旨其实乃在于通过对诸如穆敏老爹、阿麦德、马尔克等人物形象的生动描绘真实贴切地对当地的民情风俗，对维族民众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冷静、幽默而又从容的乐观应对姿态进行相对到位的艺术表现。这也就是说，虽然《杂色》与《在伊犁》中均已出现了可以直接对应于王蒙并与王蒙的新疆生活经历有着紧密关联的如曹千里、王民这样的人物形象，但王蒙作为一个公民的自我深层的“文革”经验却一直并未被真正触动，也一直并未真正进入王蒙的艺术表现视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则必须承认，只有到了本文所要具体论述的《狂欢的季节》这一小说文本中，王蒙“自我”的“文革”经验才真正地触及，并被进行了相当深入到位的沉思与表现。而这，也正充分地证明了《狂欢的季节》在王蒙的一系列与“文革”存在紧密关联的作品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当然，

也同样充分证明了《狂欢的季节》在王蒙整体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

在对《狂欢的季节》进入深入剖析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将这一小说与“文革”后大陆其他以表现“文革”而著称于世的小说作一番粗略的比较，以更见出其在表现“文革”作品中的独特性来。应该承认，在《狂欢的季节》之前，确已出现了一批以表现“文革”而声名显著的小说作品，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古华的《芙蓉镇》、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乃至于铁凝的《玫瑰门》以及她新近问世的《大浴女》，当然也包括如王安忆《六九届初中生》与《长恨歌》这样的作品在内。这些小说的基本内容可以说都没有离开对“文革”的表现，或者说小说的成功与其对“文革”的表现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但是如果我们对上述作品作一番认真的剖析，即不难发现，这些小说几乎全部都是围绕某一个具体主人公（比如《班主任》中的谢惠敏、《绿化树》中的章永磷、《玫瑰门》中的苏眉与司绮纹、《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等）的具体人生经历而展开对“文革”的描写叙述的，只不过对于这些人物形象而言，他（或她）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乃是“文革”而已。因此，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勾勒与塑造刻划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作家对“文革”进行返顾、观照与反思表现的过程。与上述作品相比较，王蒙《狂欢的季节》的独特性乃在于作品的写作主旨就是通过对“文革”与知识分子之间复杂关系的双重审视，全面地对“文革”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生动真实的再现、观照与反思。此处之特别强调“全面”，原因在于，虽然王蒙的整体“季节”系列带有突出的自传性色彩，钱文乃是贯穿整部“季节”系列的一个主要人物，但从《狂欢的季节》这一具象文本而言，则很难说钱文就是其中唯一的主人公。细读文本即不难发现，除钱文之外，祝正鸿、犁原、陆浩生、张银波、赵青山等知识分子都

在作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虽然由于整体“季节”系列写作体例的规范，钱文所占篇幅要较其他人更多一些，且作品也有不少段落是通过钱文的视角进行描写叙述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就人物在文本所占本质性地位而言，则钱文与祝正鸿、犁原等知识分子并无等级性差异。正如同《恋爱的季节》中的钱文只是那一批工作于团委的年青人中的一位成员一样，《狂欢的季节》中的钱文也只是王蒙所欲描写的一批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在突出凸现小说审视反思“文革”历史经验这一主题方面，钱文所实际产生的效用与祝正鸿他们是等值的。这也就是说，在《狂欢的季节》中，王蒙正是要通过对以上这些人物形象的描写刻划，来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这些知识分子们那形态殊异各不相同的人生遭际与人性变迁。而也正是在展示描写这些知识分子众生相的过程中，王蒙达到了他“全面”地以正面切入的方式描摹、观照并进而反思“文革”的创作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则不妨说《狂欢的季节》正是钱文、祝正鸿、犁原、陆浩生等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所组成的一部多声部合奏的深沉而韵味悠长的交响曲，这若干个声部中的每一个对于表达主题的需要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狂欢的季节》就不像此前所论其他作家之表现“文革”的作品一样，是紧紧围绕某一位主人公的人生历程去更多地是以侧面切入的方式透视表现“文革”，而是通过对一批知识分子的描写刻划以正面切入的方式全景式地展开了对“文革”的审视与表现。在笔者看来，这一点正是《狂欢的季节》与“文革”后大陆其他同样以表现“文革”而著称于世的小说作品之最根本的区别所在，作品的独特性也由此而充分地得以证明。

说到《狂欢的季节》对“文革”中知识分子表现形态各不相同的灵魂变异进行了成功到位的观照与审视，首先要解读分析的当然是钱文。但在具体展开对钱文的分析之前，有一点必须强调